

■ 国际共运史研究 ■ 栏目主持: 高放(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倍倍尔的议会斗争思想及实践

◎赵 婷

摘 要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的议会活动家,他在德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的议会斗争思想,主张在坚持革命原则性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议会斗争的方式和策略,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议会斗争与议会外斗争相结合,既反对否定普选权和议会斗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反对迷信议会活动、放弃革命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关 键 词 倍倍尔;议会斗争;普选权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重大项目“国外共产党适应性变革与社会主义道路新探索研究”(2016JJD710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2015M572002);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5GN022)

作者简介 赵婷,法学博士、博士后,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山东 济南 250100)

DOI:10.16059/j.cnki.cn43-1008/c.2017.06.004

奥古斯特·倍倍尔(简称“倍倍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杰出的议会活动家。从1868年开始,倍倍尔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经常通过信件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教革命斗争中的问题,报告德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交流的过程中,倍倍尔成长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从1867年起,倍倍尔一直作为国会的议员参加议会活动(1881年到1883年除外),直至其1913年逝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倍倍尔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德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巧妙地结合起来,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议会斗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方式

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在政治上比英国

落后许多,还处在小邦分立、封建关系残余较多的时代。虽然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封建势力还很强大,且农业人口占多数。1865年,恩格斯在文章《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认为,在没有将农村无产阶级争取到工人运动之前,光靠城市的无产阶级是无法取得革命成功的。恩格斯承认了普选权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意义,他认为资产阶级应该干脆要求直接的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这虽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是工人阶级可以借助这些基本权利,利用普选权和在议会中的斗争,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① 1866年底,北德意志各邦制定了联邦宪法,并且决定召开联邦制宪国会。1867年2月,倍倍尔在格劳豪——梅内拉选区被选入北德意志制宪联邦国会,并在同年8月份与威·李卜克内西一起当选为第一届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对于这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3页。

一成就,恩格斯非常重视,并且建议在以后的选举中尽量多提名工人候选人,让更多的工人代表进入议会。

社会民主党多次在党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的斗争方式和策略问题,也在党的报刊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争论。倍倍尔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针对19世纪中后期德国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实际,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势,认为议会斗争应当是党从事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和策略。

(一) 议会斗争的目的在于鼓动和宣传

19世纪后半期,虽然普选权在德国逐步确立,但是帝国国会的权力很有限,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立法机构,受到俾斯麦及皇帝的控制。德国在本质上仍是阶级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倍倍尔在参加议会活动的初期就明确认识到,议会斗争作为党的一种斗争方式和策略,其目的不在于能在议会中获得多少利益,而在于鼓动和宣传,在于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和为党争取更多的群众。

1870年6月举行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关于参加帝国国会和关税议会选举的决议”,决议中明确了党对待议会选举的态度。决议规定,党参加选举主要是为了进行宣传和鼓动。1873年8月,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帝国国会选举的决议”,规定“社会民主党仅把帝国国会选举看成宣传鼓动的手段和传播党的原则的试金石”^①,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待议会斗争的态度。

(二) 议会斗争应充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极力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

倍倍尔认为,除了在议会中宣传党的思想和原则之外,社会民主党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争取通过立法途径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保障工人阶级的劳动权益。“从这个考虑出发,党的国会议员多年来就在国会中倡议工人保护立法,它的内容包括:规定正常的工作日;

制止夜班和节假日加班;在某些对妇女身体有害的工业部门限制或禁止妇女劳动;禁止童工;成立保证工人能行使自己权利的劳动法庭;对大小工业以及家庭工业进行监督,等等”^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斗争,迫使俾斯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法案,比如1883年疾病保险法,1884年意外事故保险法,1887年关于限制童工、女工工作时间、星期日休息制的法案,以及1889年的老年保险法等等。^③

虽然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一些旨在改善工人阶级劳动条件的法案屡遭否决,但是它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使社会民主党与工人阶级和群众的联系更为密切,促进了工人阶级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提出这些法案,社会民主党给予政府和其他政党不小的压力,迫使他们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而且,倍倍尔认识到,德国的工人运动相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讲还比较年轻,还不够成熟,所以要逐步争取广大工人阶级和群众,通过一些实际措施来提高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

合法的议会斗争须与秘密斗争相结合

倍倍尔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袖,领导社会民主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方式和策略作了一定的调整。他认为,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应该把合法的议会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党的宣传,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争取更多的工人和群众。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之初,倍倍尔就坚信“这个法令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④。

(一) 参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

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党和工会的机关报遭到查封,政治性的报纸已无法在国内出版。为了宣传和解释党的策略和原则、批判警察和法庭的反动行为,创办一份坚持原则的报纸是非常有必要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在国外出版的第一家报纸,是由卡尔·希尔施在比利时布雷达创

^①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0-71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倍倍尔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8-189页。

^③寇云田:《试论倍倍尔在第二国际时期的议会活动与思想》,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8年,第16页。

^④ [德]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一生》第3卷,薄芝宇译,三联书店,1978年,第7页。

办的《灯笼》。不过倍倍尔认为这份报纸内容简陋,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努力下,1879年9月28日,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苏黎世出版,并且发表了由报纸出版部和编辑部署名的号召,指出了创办这份报纸的必要性和意义,并表示要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斗争。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期间,倍倍尔不仅自己积极为报纸撰稿,还积极争取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报纸的撰稿人。恩格斯为该报撰写了许多文章,对该报坚持党的原则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以及倍倍尔等人的监督和协助,《社会民主党人报》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原则,正确运用了党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传播。恩格斯曾称赞它“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①。

(二) 组织召开并参与各种集会、党代表大会

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社会民主党举行的集会或者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演说经常遭到警察的禁止和干涉。但是,为了宣传党的思想和行动,为了加强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及向群众报告党在国会中的活动,又必须组织一定规模的群众集会或者小规模党员同志们的集会。在这种形势下,以倍倍尔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不断地与反动势力周旋,寻找一切机会进行公开的或者秘密的集会,争取在县和邦等更大范围内举行集会。

除了参与和组织集会之外,倍倍尔还积极筹划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由于反社会党人法的实施,社会民主党已遭解散,在此期间便无法在德国国内举行党的代表大会。1880年8月举行的维登党代表大会、1882年8月举行的苏黎世党代表大会、1883年3月底4月初举行的哥本哈根党代表大会以及1887年10月举行的圣加仑党代表大会,都是在外国举行的。而且,由于在此期间党面临的斗争形势比较恶劣,党代表

大会也无法按照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不过,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时期,召开这几次党代表大会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此时遭受打击的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还为广大党员同志和群众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三) 推动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德国的传播

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社会民主党党组织被取缔,党的出版中心、报社都遭到查封,正常的出版活动已无法在国内开展。另外,在反社会党人法刚刚颁布没多久,党内出现了一些无政府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对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立场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思想觉悟,以及统一党内的思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人认为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工作,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进一步传播。为此,188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宣传性小册子委员会,专门负责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力求满足社会民主党及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恩格斯对党的这一做法非常支持,并且为小册子委员会提供了具体指导和帮助。

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在小册子委员会的策划和推动下,苏黎世的人民书店出版了三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的论文《马尔克》的单行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第2版、新版《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著作。从1885年起,人民书店开始编辑《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一直出版到1890年。^②除了这些在国外出版的著作,德国国内也秘密出版了一系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比如《哲学的贫困》德译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在倍倍尔等人的支持和推动下,小册子委员会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极大地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议会斗争的具体方式和策略可根据具体形势变化和调整,但必须坚持革命的原则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9页。

^②殷叙彝等《第二国际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议会斗争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作用、关于工人阶级政党的议会斗争方式和策略的观点,是随着欧洲革命形势、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形势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从最初对革命形势作了比较乐观的估计,到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从最初严厉批评法国和德国议会的虚伪性和软弱无力,到逐渐承认普选权和议会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倍倍尔等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在不同时期对于议会斗争的态度也是比较灵活的。

1870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关于参加帝国国会和关税议会选举的决议”,指出党参加选举主要是为了进行宣传和鼓动,所以议会中的党代表应该充分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对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提案须持否定态度,并且要利用一切机会揭露资产阶级议会机构的虚伪性。决议还建议,在选举时,党在没有提名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可以支持其他在政治上基本站在本党立场上的候选人。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的这些提议,既为党进行议会斗争明确了基本原则,又为党参加议会选举提供了灵活多变的方式和方法,有利于党在议会活动中根据具体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策略。

1880年2月和3月,针对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特殊情况,倍倍尔在由其起草和签名的传单“芬德尔先生和社会民主党”中对党在议会斗争中的策略作了一些调整。他指出,党在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可以在具有共同认识的政治问题上,与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采取联合行动。在同年9月份,倍倍尔代表党的领导机构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对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的任务提出了建议和要求,并且为党提出了新的策略口号,即“党的义务在于运用一切手段,使党发展壮大,并且使一半是敌人的人变成朋友,使不是由于阶级利益而是由于无知成为敌人的人变成自己的拥护者”^①,并建议各地方的党员同志充分发挥积极

性和创造性,根据各地方的具体形势采取适当手段进行斗争。在倍倍尔的带领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将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议会斗争和议会外斗争结合起来,并且利用资产阶级各政党以及统治阶级中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为工人阶级争取了许多利益和权利,扩大了党的影响,争取了更多群众的支持。

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迫于工人运动的压力,德国政府一方面对工人阶级的要求作了某些让步,比如颁布了一些劳工保护法、工商业管理补充条例等,安抚工人阶级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又计划实行高压手段,策划通过防止颠覆法、小反社会党人法、苦役监禁法等方式继续反对和打压社会民主党及工人阶级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倍倍尔对国会选举中的策略问题又提出了新的意见。他认为,当时国会选举的主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包括选举权、结社权等,维护当时的立宪制度,并避免出现反动的、反议会的军事专制制度。所以,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应该赞成帝国国会具有的预算权,支持帝国国会立法充分保障结社自由权和集会的权利,反对其废除或者限制劳动保护和工人保险的条例,反对其任意扩充军备、增加军费开支等等。

总体上来说,倍倍尔认为,议会斗争作为一种方式和策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具体的斗争形势进行调整。而且,在进行议会斗争时,一定要坚持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讲究斗争的策略问题。

“议会斗争”≠“议会道路”

倍倍尔的议会斗争思想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斗争形势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法国、德国等国家的议会民主政治有所发展,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形势的发展,开始强调在一定条件下合理利用议会手段的必要性。就德国的具体形势来说,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成立后,联邦层面的普选权得

^①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90页。

以确立,使参加议会斗争成为可能。倍倍尔不仅自己积极参与议会活动,利用议会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目标和原则,还为社会民主党制定了灵活的议会斗争方式和策略,使党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促进了党的发展壮大。

不过,倍倍尔所主张的“议会斗争”与伯恩施坦等人所主张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有着本质区别。为了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坚持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和革命策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等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起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倍倍尔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方面,他在与考茨基、阿德勒、伯恩施坦等人的通信中,批评和反驳了伯恩施坦的许多观点,并且明确表示了他对伯恩施坦观点的看法和态度;另一方面,他在1898年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1899年汉诺威党代表大会、1901年吕贝克党代表大会、1902年慕尼黑党代表大会、1903年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都针对伯恩施坦问题作了发言,有力地批评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并在汉诺威、吕贝克、德累斯顿这三次党代表大会上主持通过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决议案。另外,倍倍尔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批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章,阐述了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策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报告和文章有1899年10月10日在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报告、1901年9月24日在吕贝克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02年9月15日在慕尼黑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03年9月17日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还有发表在《新时代》第21年卷(1903-1904)第2卷上的“就副议长问题及有关事宜的补充意见”等。

伯恩施坦等人认为,应该放弃传统的阶级斗争,代之以改良的、渐进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策略,即利用选举权、合作社、改善民主制度的政治机关和经济机关等方式逐步实现社会

主义。而且认为工人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没有能力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事情。倍倍尔则认为,伯恩施坦等人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对德国来说是不现实的。首先,德国仍然是一个半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国家,政治制度具有非常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帝国国会并不是一个十分民主的政治机构,它名义上是立法机关,但是它通过的法案必须经过联邦会议和皇帝的认可才能生效。而且,国会并没有任免首相的权力,财政权力也比较有限。所以,德国的议会民主并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的议会民主,依靠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其次,德国目前所取得的政治进步是很有限的。倍倍尔指出,选举权和结社权在有些地方甚至恶化了,而议会斗争的作用也或多或少地被夸大了。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日益强大,但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却十分软弱,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领导力量。而且,倍倍尔不同意伯恩施坦认为工人阶级政治上不成熟的观点。他指出,“组织起来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迄今已经到处证明并且每天都在重新证明,他们在政治教养、理解力和工作能力方面都大大超过资产阶级及其在革命年代所取得的成就。”^①推翻资产阶级的任务只能依靠工人阶级来完成,这是工人阶级的事业。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也要不断争取其他同盟军的支持。

倍倍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认为广大工人阶级是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的主要力量。而且,无产阶级政党是革命的政党,其目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制度,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则性界线。党可以利用选举权、议会斗争等合法手段为工人阶级争取合法权益,但这只是一种方式和策略,单纯迷信合法斗争和民主是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

(责任编辑:金石)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第218页。